

# 中秋饮食俗尚

## ——兼论戚继光与食芋传说

谢忠志

### 一、前言

中秋为农历八月十五,因「秋月独盛」以为佳节。□时序上,有天数的安排,正如唐人欧阳詹(755-800)言:「秋之于时,后夏先冬,八月于秋,季始孟终,十五于夜,又月之中,稽之天道,则寒暑均,取诸月数,则蟾魄圆,故曰中秋。」□中秋节的异名多与月、秋有关,如月节、月夕、八月半、端正节、半秋、仲秋节等多名称;也因重视「月圆人团圆」,而又被称为团圆节。□中秋节的传说众多,也是历代文人墨客的歌咏对象,成为古代中国以来最饶富诗情的节日之一。不仅如此,中秋节的相关庆祝活动,也影响临近的日本、韩国与越南等东亚文化圈国家,实为该国内重要年节之一。

农业社会以「秋收谢神」为重要的祭典仪式,因而早期的秋节活动,以「祭月」居多。中秋成为节日,有人认为可追溯春秋时期,晋平公(?—前532)是最早制定此节日的君王。□但实际上,唐代的文人才开始重视过中秋节,在此习气的引领下,赏月、玩月成为主要的秋夜活动;自中唐后,这项专属的活动逐渐约定俗成。宋人则延续唐代风气,中秋咏月成为惯例,同时也把原属于仕宦的活动,逐步拓展到各阶层,成为雅俗共赏、家族团聚与举国同欢的一个节庆。□

明代中叶后,社会踰礼犯分的情况严重。但反映在传统礼俗上,社会风俗因而呈现丰富多元的面貌。大体而言,明代的岁时节庆与文娱活动,宗教色彩已较前代淡薄,礼仪、娱乐的意义则被凸显,使得这个传统节庆在明代,因习惯、地域与民族等不同组成而大异其趣。□我们今时中秋过节的氛围,可以说是在明代时期奠定。综论明代社会、生活与民俗等专论成果丰硕,单论「中秋」的论说却无,殊为可惜。中秋节是个值得深究的生活子题,它不仅把能显现明代饮食、娱乐与宗教等文化层面,特别的是,此节日在明代还充满着「反蒙抗元」的民族情怀,而与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及唐明皇游月殿等故事,成为街头巷尾的月节传奇,流传至今而未灭。

「百里不同风,千里不同俗」,明代中后叶是个社会风俗巨变的时期,不同空间、性质与发展的城市、乡镇,在岁时节庆上也均有其特色与意义。□要了解节庆对人们的意义,最快的方式就是透过饮食,它不仅是供给生活的需求,也是烹调技艺的展现。从饮食文化,能略窥明人优游在中秋生活的乐趣,也能体现佳节的历史意涵与时代意义。

① 明·吴昭明,《五车霏玉》(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子部第178册,台南:庄严文化,1995,据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影印),卷3,页144。

② 明·李诩,《戒庵老人漫笔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97),卷7《佳节月忌忌月》,页305-307。

③ 明·李一楫,《月令采奇》(收录于《岁时习俗资料汇编》,台北:艺文印书馆,1970):「十五日,曰中秋节,曰月夕节,曰端正月,曰半秋,曰三五夕。又龙神交会日,黄帝骑龙上升日。」

④ 明·董斯张,《广博物志》,卷4《时序》,页258。

⑤ 熊海英,《中秋节及其节俗内涵在唐宋时期的兴起与流变》,《复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05.6:135-137。

⑥ 郑师渠、陈梧桐,《中国文化通史·明代卷》(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,2009),页478。

⑦ 张勃,《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》(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1),页307-308。

## 二、祭月果饼必圆

### (一)秋夜祭月

中秋的饮食俗尚,与祭拜月亮的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。明代的拜月形式多种,最简单的方式为朝月膜拜、跪拜。拜月的神祇,通常以「月神」统称,也称月姑、月宫娘娘、太阴月光神等道教神仙名称,亦有以嫦娥为月神的祭拜活动。也有人供奉月光神马、月姑木像或放置月宫符像,摆设供品,往月出方向朝拜。

明人「中秋供月以饼」,<sup>①</sup>除月饼外,众多供品中,仍以蔬果、花卉为多,但南北大不相同,北方以梨子、苹果、葡萄、西瓜、毛豆与鸡冠花等为祭品,南方则是用柚子、芋头、香蕉、柿子、菱角、花生和莲藕等为主。民间有「男不拜月,女不拜灶」的习俗,因而祭仪多由女性担任,但实际上男女共同肃拜烧香的情况仍十分常见,大人拜毕后,儿童再拜。至于祭拜的时间,信众当然会等月亮高挂时才烧香祭拜。<sup>②</sup>完整的祭典仪式,可从《帝京景物略》一窥究竟:

八月十五日祭月,其祭果饼必圆;分瓜必牙错,瓣刻之如莲华。纸肆市月光纸,绩满月像,跌坐莲华者,月光遍照菩萨也。华下月轮桂殿,有兔杵而人立,捣药臼中。纸小者三寸,大者丈,致工者金碧缤纷。家设月光位,于月所出方,向月供而拜,则焚月光纸,撤所供,散家之人必遍。月饼月果,戚属馈相报,饼有径二尺者。女归宁,是日必返其夫家,曰团圆节也。<sup>③</sup>

祭拜结束后,燃烧月光神马,连同画在纸上的月宫、兔子等一起烧掉,撤去供桌。<sup>④</sup>大家伴着明月共享供品,一起宴饮,而地方的耆老士绅,讲述嫦娥奔月、玉兔捣药、吴刚伐桂与唐明皇游月宫等应景故事与乡里民众同乐。这样的饮食活动,明人经常通宵达旦,竟夜欢庆。<sup>⑤</sup>

中秋过节的精神是团圆,即使妇女回娘家省亲,此天必定返家,与家人饮酒啖饼,共赏月色。<sup>⑥</sup>众人吃月饼呼应圆月、团聚,即使如徐霞客(1587-1641)中秋时在云南游历,无法与家人团聚,也会预先买饼赏月度节。<sup>⑦</sup>因应节庆所需,京城的商家自八月初一起,就开始贩卖月饼,多数家庭则多提早几天制作月饼。至十五夜,家家户户拜月后分食月饼等供品,同时喝酒、饮苏叶汤,也大啖螃蟹并醃醋、蒜等酱料增添口感。<sup>⑧</sup>拜神、吃饼,是中秋节不可或缺的两大活动,月饼成为中秋节最具特色的食品。

### (二)秋夜吃月饼

根据考究,月饼可能源自西域的「胡饼」。如西晋司马彪(243-306)在《续汉书》提及东汉时期就有胡饼,灵帝(156-189)喜欢吃胡饼,而带动洛阳吃饼的风气,显见胡饼在东汉是十分常见的饼食。<sup>⑨</sup>唐人虽开始过中秋,但多摆设酒宴共赏明月,并未将「胡饼」作为搭配过节的食品。若从名称来看,宋代以后,才出现「月饼」之称,如周密(1232-1298)的《武林旧事》中,就将

① 明·张瀚,《松窗梦语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85),卷7(时序纪),页137。

② 李露露,《图说民间传统节日》(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5),页152-154。

③ 明·刘侗、于奕,《帝京景物略》(北京:北京古籍出版社,1983;台北:世界书局,1963)。

④ 郑师渠、陈梧桐,《中国文化通史·明代卷》(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,2009),页480-481。

⑤ 明·刘若愚,《酌中志》(《明代笔记小说大观》第4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),卷20(饮食好尚记略),页3064-3065。

⑥ 南炳文、何孝荣,《明代文化研究》(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6),页332。

⑦ 明·徐弘祖,《徐霞客游记》,第10册上(滇游日记十二):「是夜为中秋,余先从顺宁买胡饼一圆,怀之为看月具。」

⑧ 明·刘若愚,《酌中志》(《明代笔记小说大观》第4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),卷20(饮食好尚记略),页3064-3065。

⑨ 宋·李昉,《太平御览》,卷860(饮食部十八·饼),页3949:「《续汉书》曰:『灵帝好胡饼,京师皆食胡饼。』」显见胡饼在当时是常见的食物。

一种蒸熟的饼食，称为「月饼」，我们在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亦能看见相同史载，<sup>①</sup>因此可以推断南宋时期开始有吃「月饼」的习惯，月饼属于胡饼的一种。

要到明代，才把月饼从胡饼独立出来，跟中秋节庆、团圆意象结合在一起，让它成为专属于中秋的饮食文化。中秋的意涵，正如田汝成(1503-1557)在《西湖游览志余》所记：「八月十五谓之中秋，民间以月饼相遗，取团圆之意。」<sup>②</sup>田汝成成为杭州人士，显然嘉靖时期吃月饼且馈赠给亲友联络感情，为秋节重要的活动。大体而言，明代月饼只是一种「圆饼」的别称，其他地区的月饼虽有团月饼、团圆饼或团饼等称呼，<sup>③</sup>但明人重视的是「圆形月饼」的形制，对名称、大小与内馅并无详加规范，因而有月饼「径二尺者」。<sup>④</sup>

明人落实中秋吃月饼的饮食文化，约在嘉靖时期才约定俗成且蔚为风潮。如河南许州，在当时就以月饼作为中秋祭拜、宴饮的主轴。<sup>⑤</sup>通常民间比较热中参与中秋节庆，与秋收农闲有关。宫廷多以赏月、翫月为主，饮食活动并非主轴，太祖在位期间，仅有四次在中秋宴请群臣，通常在奉天门举行，因奉天门为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。<sup>⑥</sup>靖难后，仅有成祖在永乐九年(1411)「赐文武羣臣宴」，此后的一百六十多年，未见这种大规模君臣同乐的饮食活动，直到万历六年(1578)，神宗才开始在中秋赐给张居正(1525-1582)等人酒膳与月饼。<sup>⑦</sup>

明史上，神宗、熹宗二帝最为重视中秋节的饮食风尚。神宗在位四十八年期间，有三十二年的中秋节，不定期的将秋露白酒、肉脯与月饼等食品赏赐给内阁辅臣，与臣僚同欢节庆，但规模已不如洪武时期盛大，不以群宴，改用二至四辅臣为赏赐对象。这样的习俗也为熹宗沿袭，除天启四年(1624)外，在位期间的中秋节，几乎年年赏赐珍馐。月饼较为通俗常见，并非帝王赏赐的主要食品，但在万历、天启合计五十年间，仍有十一次赏赐月饼给辅臣(其中一次为天启朝)，占22%，比例虽不算高，但也能看出月饼已融入宫廷饮食。

食用、馈赠月饼成为明人的中秋习俗后，不论官民或士庶家庭，从八月上旬开始着手制作大小不等的面饼，相互馈赠。明代的月饼，作法并无特殊，多是将白面饼蒸炊、烧烤，通常只具有面粉味道。虽然明代典籍没有记述月饼的种类，但在《金瓶梅》里，曾记载有裹以水果内馅与洒上椒盐的月饼，亦有使用玫瑰作为提味，多为官宦之家食用，以增加口感与风味。<sup>⑧</sup>此外，八月是桂花盛放的时节，明人虽多酿成桂花酒，但也有制成桂花饼、桂花糕，显见应有桂花口味的月饼。

京城的糕饼商家因应节庆所需，自八月初一起，就开始贩卖月饼，<sup>⑨</sup>商家的月饼形制也与家庭区隔，一般的月饼以素面居多，商家则颇有巧思，在饼面上增添纹饰，如应景绘制「月中蟾

① 宋·周密，《武林旧事》(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)；以及宋·吴自牧，《梦粱录》(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4)，卷16〈荤素从食店(诸色点心事件附)〉。

② 明·田汝成，《西湖游览志余》(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585册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3)，卷20〈熙朝乐事〉，页11b。

③ 如河南夏邑称团月饼，海南琼台称团圆饼，可参见明·郑相，《(嘉靖)夏邑县志》(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》第14册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5)，卷1〈节序〉，页8上。明·唐胄，《(正德)琼台志》(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》第18册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5)，卷7，页186。

④ 明·刘侗、于奕，《帝京景物略》。

⑤ 明·张良知，《(嘉靖)许州志》(据明嘉靖刻本影印)，卷7〈典礼志·风俗〉：「中秋为月饼祭月、相宴饮。」

⑥ 明太祖于宫廷举办中秋宴会，分为洪武八、二十、二十四与二十六年。一般在奉天门举行，仅有洪武二十四年改至华盖殿。

⑦ 《明神宗实录》，卷78，万历六年八月甲午条，页5a。

⑧ 可参见明·笑笑生，《绣像金瓶梅词话》(台北：雪山图书有限公司，1993)，第10回〈武松充配孟州道，妻妾翫赏芙蓉亭〉，页157；第95回〈平安偷盗假当物，薛嫂乔计说人情〉，页425。

⑨ 明·刘若愚，《酌中志》(《明代笔记小说大观》第4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)，卷20〈饮食好尚纪略〉，页3064-3065。

兔」的模样，藉此卖相增加销量，而深受妇女、孩童喜爱。<sup>①</sup>京师商贩视为有利可图，不仅在月饼中添加水果为内馅，也专为月饼打造巧名、特立异状，使一个月饼的售价甚可达数百钱。<sup>②</sup>沈榜(1540-1597)为湖广临湘人，神宗万历十八年(1590)任职顺天府宛平知县，任内访求史事，完成《宛署杂记》一书。书中叙述北京军民中秋过节的氛围，令人见识到赀财丰厚的宦宦之家，一掷千金只为赏月吃饼。

尽管广西横州虽较为偏僻，且华夷杂处之地，但中秋实为地方欢聚的一大盛会：

城中郭外之家，遇夜必设一大月饼，宰白鸡鱼肉，盛陈瓜果，至十余品者。或于通衢，或于院落间，一家之内，无问老幼皆集所设处，拜月欢饮，箫鼓讴歌，声闻远近，达旦方已，虽家贫亦不废此。<sup>③</sup>

横州的中秋节，在民间社会宴请重视排场与菜色多样的习尚相染下，使得饮食日渐丰侈。王济(?-1540)时任通判，认为横州过节的立意虽好，其过节氛围甚至连江浙地区都无法相比拟，但崇奢、竞奢的饮食风气，不禁令人感叹「此地之俗多可鄙」。

### (三)八月十五杀鞑子

迄至今时，月饼仍是中秋应景的食品。尽管众人对月饼来历不求甚解，但最通俗也最脍炙人口的传说，即是朱元璋(1328-1398)在刘基(1311-1375)建议下，将「八月十五杀鞑子」的讯息藏入月饼，使得月饼成为传递军情、对抗蒙元的重要工具。类似说法众多，但不出「中秋节藏纸条在月饼」的主旨。

上述流传至今的历史记忆，翻阅明代的史籍却无相关记载。根据学者陈学霖的考究，不仅发生的时间不吻合，对蒙古人凌虐汉人的相关指控亦无文献左证。至于选定「八月十五中秋」为起义日子，除有起义发起者利用节庆机会采取行动外，而闰八月十五在民间信仰为「三元劫动」，也就是变天的日子，因此对民间较有特殊涵意。<sup>④</sup>这些「滚雪球」(snowballeffect)而成的街谈巷议，历经汉人对抗清朝统治、清末中国对抗西方列强时期，成为强化非我族群的敌对关系，以联系华夏民族的情感，参杂着夸大、虚假成分。

中秋团圆设宴聚会，并不只有吃饼赏月，当天除吃月饼，也会配合时节吃应景食物，最常见的是西瓜与螃蟹。西瓜是月饼相同，是拜月的重要祭品，祭仪结束后，与亲友共尝西瓜、素肴、果品、毛豆与各类鲜果时蔬，甚至「西瓜会」的出现。<sup>⑤</sup>此时西瓜香甜多汁，明人以西瓜「供季秋之月」。<sup>⑥</sup>吃西瓜实具有求子、延续香火的意涵，对家族的意义十分重大。吃螃蟹则是因为正逢秋日，蟹肉肥美，「吃蟹」是中秋至重阳的宴饮的重要活动之一，因而唐寅(1470-1524)有云：「左持蟹螯右持酒，不觉今朝又重九。」<sup>⑦</sup>

## 三、戚继光与食芋习俗

中秋的饮食文化，虽因地域而有差异，但吃月饼是共同的饮食活动。然而，较鲜为人知

① 明·陆启滋，《北京岁华记》(附录于张勃，《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》，据上海图书馆藏手抄本标点)，页330。

② 明·沈榜，《宛署杂记》(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35编第4册，台北：新兴书局，1978)，卷17《民风·土俗》。

③ 明·王济，《君子堂日询手镜》(明万曆沈节甫辑阳羨陈于廷刊本)，页19b。

④ 陈学霖，《刘伯温与「八月十五杀鞑子」故事溯源》(《明初的人物、史事与传说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0)，页157-163。关于「八月十五杀鞑子」的说法与考究，请参看陈学霖一文，本处不作赘述。

⑤ 陈宝良，《明代社会生活史》(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4)，页543。

⑥ 明·蔡懋昭，《(隆庆)重修赵州志》(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》第2册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5，据明隆庆刻本影印)卷9，页2下。

⑦ 明·唐寅，《唐伯虎先生外编续刻》(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34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)，卷3《江南四季歌》。

的,「蒸芋」共食,也是各地方赏月不可缺的良伴。芋通常称芋头、芋艿,为本土原产的农作物,具有高产量、耐干旱、耐储存等特点;同时,它含有大量的淀粉,食用后具有饱足感,而常被民间家庭用以弥补米谷不足之时,成为度饥荒、过凶年的重要辅助性农作物。

芋有许多别称,而这些别称与它的外型有关,芋魁、芋渠,因它巨大的根实取名;蹲鸱、鹑,则因蜀地看似鸱鹑等猛禽而得名,也因取以「鸟」名,而惹出不少貽笑大方的趣闻。至于「土芝」之名,史籍仅言源自《本草》,无法得知其典故。这些名称均被明人所接受,也在此基础上,增加芋头、芋艿等更通俗的名称,而为今人沿用。至于芋的种类,有将芋分为黄芋、铁芋、米芋与黎芋,也有分为水芋、山芋、紫芋与薯蕷,明代方志试图加以厘清和说明,但似乎难以理出头绪,无法从方志看出拣选的标准,最重要的因素是修纂的官吏对农作物的知识不足,以至于认识不清,将芋、薯与山药等多种植物混为一谈,实不足为奇。

黄省曾(1496-1546)为吴县人,学问渊博,尤长于农业与畜产。着手进行芋的历史溯源、考察与归纳,著有《种芋法》一书,篇幅虽不长,但对芋的典故详加归纳:

《本草》谓之土芝,蜀谓之蹲鸱,前汉谓之芋魁,后汉谓之芋渠。叶俞县有百子芋。新郑有博士芋,蔓生而根如鹅鸭卵。今有南京芋,煮之,可拈皮而食,甘滑异于它品。茅山有紫芋。吴郡所产,大者谓之芋头,旁生小者谓之芋妳。种之水田者为水芋,但《广雅》曰,藉姑,水芋也,亦曰乌芋;《本草》乌芋,一名水萍,一名槎牙,一名茨菰,一名鳧茨;《毗陵录》谓之燕尾草,以其叶如桎也,又名田酥,状如泽泻,不正似芋,根黄而小,恐自为一种,非土芝之水芋也。《吉安录》有干湿二种,湿名水芋,干名黄芋,味差劣。《松志》苏之西境多水芋,以芋魁为旱芋,嘉定名之博罗。又有皮黄肉白,甘美可食,茎叶如扁豆而细,谓之香芋。<sup>⑤</sup>

黄省曾以《齐民要术》和《大观本草》二书为引经据典的版本,也征引《(正德)松江府志》等方志做为补充和考证。《种芋法》问世后,不仅显示芋头在明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,也能反映明代如吴县等江南地区农业技术的发展情形。

芋在植物界属天南星科(Araceae),明人已知芋与天南星植物相近,因而有些地区把天南星作为芋头的代称。王佐(1428-1512)为琼州人,曾作《天南星》,可从诗歌看出芋头对海南人民的重要性:

……君看天南星,处处入《本草》。夫何生南海,而能济饥饱。八月风飕飕,闾阎菜色忧。南星就根发,礲礲满筐收。大者或连梗,如亭如旄头。小者累十百,附大如赘疣。携来煮大铛,翁媪坐绸缪。熟盛巨瓦钵,剥嚼饱乃休。儿孙分瓦碗,满量各自由。饱睡到天明,何管蝶梦周。主母晨相过,煮茶亦见留。加敬致殷勤,洁脱烜膏油。余留上市卖,今夜赏中秋。城中剥鬼皮,比屋有价酬。外此惟果腹,闾阎以优游。海外此美产,中原知味不?<sup>⑦</sup>

王佐的《天南星》,不仅表达出芋头与海南人民生活息息相关,在八月芋头发收的时节,更成为家庭秋、冬季过活的主要食粮。面对粮食短缺,芋头适时补足人民所需,因而王佐称是「中原不知的美味」,藉以自我调侃。诗中把芋头称为天南星,黄省曾撰写《种芋法》时,并未将此名列入其中,更重要的是能印证「中秋吃芋」的习俗,为赏月的佐食。其中最为特殊的饮食

① 孟凡梅,《芋的异称理据》,《文教资料》,2014年第30期,页155。

② 冯梦龙在《古今谭概》中记载一则趣谈:某日,唐人张九龄送芋给萧灵,却故意书「蹲鸱」,萧灵不明就里,以为「恶鸟」未至,宾客了解内情后不禁放声大笑。可参见明·冯梦龙,《古今谭概》,无术部卷6《蹲鸱》。

③ 明·王臣、陈元珂,《(嘉靖)新宁县志》(《广州大典》第35辑史部方志类第61册,广州:广州出版社,2015,据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影印),卷5。

④ 明·佚名,《(永乐)乐清县志》(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》第20册,上海:古籍书店,1971),卷3《芋之品》。

⑤ 明·黄省曾,《种芋法》,《一之名》。

⑥ 郝新媛,《黄省曾〈种芋法〉研究》,《安徽农业科学》,第42卷10期,页3148-3149。

⑦ 明·唐胄,《(正德)琼台志》,卷8《土产上》。

习俗,即是把吃芋称为「剥鬼皮」。《(正德)琼台志》记载,海南在中秋节时多煮天南星,将剥食称「剥鬼皮」。<sup>①</sup>《(嘉靖)惠州府志》亦有相关记载,该方志引述《长乐志》之说,解释剥鬼皮之意为「熟芋去皮而食」,同时也提及食螺肉为「挑鬼眼」,作为吃芋的对应,但并未说明寓意。<sup>②</sup>

追溯「剥鬼皮」习俗的由来,明代典籍并无相关说法,仅有今人论著载录相掌故。其说也与南方汉人对抗蒙元有关,故事可能接续在发生在「八月十五杀鞑子」之后。内容叙述在汉人揭竿起义抗元后,不满长期遭到欺凌,便在中秋夜杀害胡人(蒙古人),并以首为供品祭月。但明王朝建立后,在「杀人者死」的原则下,汉人过中秋改用芋头取代人首,「剥鬼皮」成为中秋祭仪、宴饮的一部分。<sup>③</sup>但同如前述「八月十五杀鞑子」的传说,恐怕并非历史事实,从未在任何明代史料记载足可见其一斑。但透过方志记载,在广东惠州、琼州等府,以「剥鬼皮」为中秋吃芋的代称确是事实;而广东话中,「芋」音近似「胡」,<sup>④</sup>也为「剥鬼皮」的传说,增添几分可信度。

「中秋吃芋」确为东南地区特有习俗,但有一说法与前述「剥鬼皮」迥异其趣:世宗嘉靖年间,戚继光(1528-1588)奉命敕平倭乱,某年八月十五日,戚家军在营地欢庆佳节,却惨遭倭寇夜袭,并将其围困于山上,使其断粮人亡。数天后,士兵挖到野芋芋果腹,但未知其名。后戚继光率军驰援,感念官兵力竭殉难,遂命名「遇难」。因而,东南沿海居民在中秋节时,都吃糖烧芋芋,感谢戚家军对平靖地方的贡献。一如前述民间传说,此则亦无史事可考,芋头并无「遇难」的别名,明人也少用「芋芋」之称,反而较流传于清代,显见是个清人的偏记杂谈。但仍可从人、事、时等方面推敲,传颂迄今的缘由。

首先,在时间的考察上,发生时间为「嘉靖时期」,但或能缩小范围至「嘉靖四十三至四十五年」(1564-1566)。戚继光自嘉靖三十四年(1555),调任为浙江都司佾书,而与台州知府谭纶(1519-1577)等人着手打击倭寇,尔后成立戚家军,成为抗倭主力。嘉靖四十一年(1562),倭寇大举进犯福建,浙、闽、粤三地倭寇、海贼相互支持、互通一气,造成围捕不易,但戚继光仍成功弭平倭乱。<sup>⑤</sup>戚继光军力进驻广东,与吴平海盗集团势力的消长与叛降有关。吴平的根据地为广东南澳,南澳为一岛屿,为福建进入广东潮汕的咽喉,嘉靖四十四年九月,在戚继光、俞大猷(1503-1579)水陆夹击的合作下,吴平势力溃散,遁逃安南,来年赴水而亡。

再从戚继光的威望来看,虽然在潮州历史上不乏如韩愈(768-824)、苏轼(1037-1101)等官吏,但戚继光的确曾对广东地区的管理,提出《经略广东条陈戡定机宜疏》等建言,认为社会状况紊乱,是造成贼寇四起的主因,<sup>⑥</sup>朝廷应对广东采取更主动、积极安家抚民的作为,否则「兵彻则贼复起譬之春草,旋烧旋生」。<sup>⑦</sup>尽管戚继光并未深入广东,但考虑他为抵倭抗蒙的将领,对沿海居民、民族与国家的贡献,成为传颂的历史人物,并无令人意外之处。

回顾中国饮食史,戚继光值得一书,因传言为「戚继光饼」的发明者。戚继光饼,简称「光饼」,最早可从清人杭世骏(1696-1773)的《榕城诗话》看见相关记述:

榕城市有光饼,相传为戚继光行军时所作。中林有诗云:「饼师晓熬红炉炭,光饼罗罗出火煤。初疑穿破沈郎钱,还如压匾韩嫣弹。闻昔南塘戚将军,御倭远走东海岸。三军千里裹粮来,征发往往悞朝爨。特作此饼散军中,一串随身挂铠焊。干戈冲斥任鲸吞,临阵含哺和血汗。身经百战兵不饥,士气激发倍骁悍。以此克奏保障功,东南半壁推屏翰。将军去今二百

① 明·唐胄,《(正德)琼台志》,卷7,总页186。

② 明·杨宗甫,《(嘉靖)惠州府志》(据明嘉靖刻本影印),卷5《地理志·土俗》。

③ 可参阅徐文苑,《中国饮食文化概论》(北京: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,2005),页101。

④ 海南儋州的中秋饮食习俗,是食用去皮芋薯与甘蔗,名曰「剥虎皮」,在广东话中,「芋」音近似「虎」;在闽南语中,「芋」音亦近于「胡」。

⑤ 清·张廷玉,《明史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97),卷212《戚继光传》,页5611-5612。

⑥ 冷东,《戚继光视野下的明代潮州社会》,《广州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,2004年第3期,页23-29。

⑦ 明·戚祚国,《戚少保年谱耑编》(据清道光刻本影印),卷6。

年,饼式依然传里闹。此饼因冒将军名,妇竖知名日相唤。……」<sup>①</sup>

榕城为福州的别称,显见光饼最早来自福建,但从史料来看,此饼最初的「发想概念」,的确来自戚继光。嘉靖三十五年(1556),戚继光任职分守浙江宁、绍、台等处地方参将,负责训练陆兵,但军士饷粮短缺,为解决粮食运补问题,提出「必队设火头行锅,负之以随军;身带干粮赍裹,备之以炊爨」的建言,<sup>②</sup>这或许可视为戚继光饼最初的构想。清朝商贩曾在浙江省肆兜售光饼,改称「戚公饼」,意谓「戚少保继光兵间遗制得名」,<sup>③</sup>与《榕城诗话》记载雷同,显见此说仍有几分根据。

就上述说法,最早出现「光饼」的地方是福建福州。戚继光的军旅生涯中,自嘉靖四十一年起,开始领军前往福建抵御倭寇,尔后再被调往广东平定吴平势力,有可能才在此时落实构想,制作这种「有孔如钱」黄色的面饼,作为行军干粮。可以推测光饼的出现时间约为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,也能与「将军去今二百年」之说相应。

然而,《榕城诗话》中所引诗词,究竟为何人所作?就本文考察,「中林」实为吴廷华(1682-1755)之字,吴、杭二人交善,亦为浙江仁和同乡,曾任福建兴化通判,熟稔福建地方事务,深知「光饼」是福建流行的小吃。至于是否为戚继光作?杭世骏以「相传」表示,吴廷华则质言「冒名」,尽管已不可考,但或许是明、清二代闽、浙的沿海居民,用以纪念、感谢戚继光对地方贡献的表达方式。回顾前述的「中秋吃芋艿」之说,也许具有同样的关怀,而把这样习俗、这种植物与戚继光连结;也能与早先「剥鬼皮」的饮食习俗串连,延续这股浓厚的民族情怀。

#### 四、结 论

明代是中国传统岁时节庆的重要发展时期,主因在于这些节庆风俗已从宗教信仰解放出来,成为农闲生活、人际往来、生命礼仪、家族欢聚、家庭娱乐等多面向的文化特征。明代的岁时节庆,无论是任何阶层、身份或地域,都有形式多元与丰富多彩的生活文化。<sup>④</sup>若以中秋节而言,这个节日在明代发展成熟,而为约定俗成的习尚,它保留传统拜月的习俗,加入具有「团圆」意象的月饼,亲友可以在家赏月吃饼,共享天伦;亦可出游翫月,感受佳节氛围。在嘉靖以后,朝廷控制力薄弱,百姓生活富足,使得「逢年过节」的意义被凸显出来,形成明人特有的中秋文化。

综观明代的中秋饮食俗尚,具有三项特点:一是伴随祭月而来,祭月的目的在于祈求月神降福人间,所以准备蔬果、月饼等供品拜月,特别是改良自胡饼的月饼,呼应圆月,象征团圆。祭仪结束后,众人赏月、翫月,分食月饼,使得吃月饼更富有意义。二是充满季节色彩,中秋饮食活动,以「适时」为佳,所以蒸芋、吃西瓜、啖螃蟹与酿桂花酒,成为中秋筵宴不可或缺的佳肴,甚至侈靡相尚来欢度佳节。三是充满民族情怀,明代流行的中秋饮食俗尚,在清代以后因时代变迁产生各种样式的民族情怀,如月饼具有对抗蒙元的意义,成为传递讯息的工具;芋头早先也同样具有对抗蒙元的意涵,但在戚继光协助东南沿海抵御倭寇、海贼后,与「戚继光饼」一样,成为后代缅怀英雄人物的表达方式。(谢忠志,文藻外语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。)

① 清·杭世骏,《榕城诗话》(《知不足斋丛书》,台北:傅斯年图书馆藏清乾隆鲍廷博校刊本)卷下,页9b-10a。朱振藩引用柴萼(1893-1936)的《梵天庐丛录》为清末时期著作,《榕城诗话》应为最早记载戚继光饼的清朝文本。详见朱振藩,〈歼倭干粮继光饼〉,《历史月刊》第164期,页125。

② 明·戚继光,《纪效新书》(台北:傅斯年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一年西泉氏校刊本),卷首〈一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〉,页2b。

③ 清·陆以活,《冷庐杂识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97),卷1〈戚公饼〉,页40。

④ 陈宝良、王熹,《中国风俗通史·明代卷》,页964。